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这里走来

江西瑞金：

□ 苏春生 杨敏 廖九平

令，由代表大会根据工农利益制定和颁布，一切重大问题根据民意讨论决定。在制定法律时，让建议、起草、审议、通过、颁布五个程序衔接有序；在进行修改法律的决策时，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尊重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对法律法规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广泛征求选民的意见。

工农群众专政的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工具。苏维埃的政权机关，由工农群众所选举的代表组成，并直接对选举人负责，要定期向选举人报告工作。上至中央政府，下至乡、区苏维埃一概不能例外。并且“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这种在民主选举基础上产生的代表会议制度，保证了工农群众能选出自己所信任并能代表自己意志和利益的代表参加政权的管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苏维埃工农群众有权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直接监督。党和苏维埃政府创造各种条件倡导苏维埃公民对苏区党政工作人员实行“全方位”民主监督。苏维埃政府在工农检察部设立控告局，建立工农通讯员队伍，经常组织突击队和轻骑队进行明察暗访、突击检查等，以充分发挥群众民主监督作用。苏维埃的民主监督，还体现在广大选民对自己选出的代表具有充分的监督权。

“一府两院”的基本雏形在这里孕育

苏维埃政权创立了“一府两院”的国家基本形态雏形，它们由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苏维埃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负责、受苏维埃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监督，为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直接源泉。

探索建立权力架构。宪法大纲规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其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

探索建立行政架构。一苏大会时，中央人民委员会设有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九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二苏大会）后，人民委员会共设十一部（委）一局，增设粮食部和国民经济部，将原工农检察部改为工农检查委员会。

探索建立司法架构。从中央到地方设立最高法院和省、县、区三级裁判部的四级司法组织系统。其中，最高法院隶属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受其领导，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和国家审判程序上的最后判决机关，经其判决的案件为终审判决。地方各级裁判部由最高法院实行垂直领导，同时受同级苏维埃执委会指导，行使司法权时具有相对独立性。

探索建立五级组成架构。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包括乡、区、县、省和全国五级代表大会制。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区、县、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均由下一级代表大会按一定比例所选举的代表组成，并选举产生区、县、省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由各省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选举的代表组成，并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组成人员。

“执政为民”的初心在这里实践

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工农民主专政的政体，始终坚持为民执政、执政为民。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彻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以彻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首先，立法坚持以工农群众为中心。以合法性制度设计保证工农群众在社会中的地位，从而使广大工农参与政治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如颁布土地法，实现耕者有其田；颁布劳动法，提高工人政治地位，保障工人合法权益。其次，建设坚持以工农群众为中心。在拓宽工农群众参与政治渠道基础上，进行广泛宣传动员，让工农群众有组织地加入地方苏维埃政权和各种群众性组织，进行苏维埃各种事业建设。最后，权利坚持以工农群众为中心。让工农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依法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积极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并不断推进工农群众自身的政治解放。所以说“苏维埃实现了世界上最完整的民主制度，他是为民众直接参加的，他给予广大民众以一切民主的权利”。

丰碑永驻回峰山

——苏南反顽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张 帆

为了纪念1943年4月苏南反顽战役的胜利，缅怀在战役中壮烈牺牲的179名新四军将士，中共溧水县委县政府（2013年2月撤销溧水县，设立南京市溧水区）于1985年在白马镇回峰山北麓建造了苏南反顽战役阵亡将士纪念馆。纪念馆根据山麓地形而建，主要分为牌楼、碑亭、纪念塔三个区域。自牌楼沿台阶逐级而上，在碑亭的正中，竖立着一块3米长、2米高的花岗岩石碑，碑上刻有原新四军十六旅旅长王必成题写的碑文，全文如下：

苏南反顽战役，是苏南抗战史上著名的战役。一九四三年三月，日伪开始对我苏南茅山、太滬地区“清乡”。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配合默契，撤退其苏南、皖南、浙西等地对日防务，调集十二个团一万五千余兵力，迂回包围，东西夹击，大举进攻我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新四军主力部队驻地溧水地区，企图消灭苏南新四军主力，取消苏南抗日根据地。我婉转陈词，一再退让，仁至义尽，希冀国民党顽固派停止进攻，共御外敌，但均告无效。新四军十六旅和抗大九分校共四个团五千余人，迫不得已，奋起自卫。自四月十二日凌晨至十五日凌晨，同来犯的顽军六次激战。在东线，我十六旅四十八团、四十六团、旅部特务营和五十一团二营，迎战顽挺进军、忠救军五个团，出击上兴埠、七里山，坚守曹山，夜袭回峰山、北经巷，重创来犯的顽军，守卫了我方阵地，击破了顽军的包围圈，打开了撤向敌后的通道。在西线，我抗大九分校三个营和四十七团一营，面对国民党主力五十二师、一九二师，以及江苏省保安纵队共七个团的猛烈进攻，从里佳山、观山、铜山到芝山、和尚山一带，浴血奋战，节节抵抗，牵制了顽军主力，配合了东线战斗，赢得了转移的时间。是役，我共歼顽军二千余人，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苏南新四军主力的阴谋，取得了苏南反顽战役的胜利。战斗中，抗大九分校一大

队大队长汤万益、政委唐昆元、副大队长文有武、三中队长张茂发、二大队五中队长陈吉冲、旅部特务营二连连长宋玉琳等一百七十九人为国捐躯，光荣牺牲。值此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溧水人民立碑建塔，纪念苏南反顽战役的胜利，纪念在反顽战役中英勇献身的人民英雄。

苏南反顽战役中英勇献身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王必成
一九八五年五月

碑文记录了苏南反顽战役的发生背景、具体过程和胜利成果。回望80年前的岁月，感悟苏南反顽战役取得胜利的精神力量，备受鼓舞。

坚如磐石的革命信念。在苏南反顽战役打响前的1943年4月3日，新四军十六旅旅政委江渭清召开排以上干部会，作了《制止反共摩擦，求得继续团结抗战》的动员报告；苏南反顽战役取得胜利后的4月20日，新四军第十六旅发布了《为呼吁团结抗战公布友军“清剿”真相告江南同胞及友军官兵书》；4月28日，新四军以第十六旅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的名义，发出了《反对进攻新四军，残害江南人民，破坏团结抗战向友军提出严重抗议书》。这些党史资料以大量事实揭露了顽军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顽军放弃前线对侵华日军的防务，集中兵力进攻新四军，扬言“消灭苏皖新四军”“打死王必成，活捉江渭清”“争取第二次皖南事变胜利”，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新四军十六旅始终听党指挥，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定全民族抗战的必胜信念，才取得了苏南反顽战役的胜利，保卫了苏南抗日根据地。

不怕牺牲的坚强意志。在苏南反顽战役中，最艰难的一场战斗是铜山战斗。防守铜山阵地的是抗大九分校，抗大九分校突出特点是边战斗边学习，以战斗保卫学习。学员是军政干部，战斗经验丰富，但武器太差，主要是步枪和很少几挺



机枪，平时背的子弹袋里只有几颗子弹，其余塞的是芦柴杆子。战斗中，弹药打完了，学员们就用刺刀、枪托跟顽军正面拼杀，用石头砸向扑上来的顽军。在铜山战斗中，抗大九分校伤亡200多人，特别是抗大九分校一大队大队长汤万益（29岁）、政委唐昆元（23岁）、副大队长文有武（30岁）等年轻干部英勇牺牲。汤万益是一员猛将，曾在战斗中伤残了一只眼，人称“汤瞎子”。反顽战斗中他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不幸中弹牺牲。抗大九分校在苏南反顽战役中以血的代价保障了大部队胜利突围，映照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坚强意志。

溧水人民的鼎力支持。新四军十六旅到达溧水后，严格执行群众纪律，转移宿营地时派人逐门逐户检查门板是否上好，稻草是否捆好，借物是否归还。在溧水，百姓口口相传“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在苏南反顽战役最关

键的回峰山一北经巷战斗中，枪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惊醒了村民。村民搬出自己家的茅柴放到村边点着，吸引顽军火力；将自己家的棉被和方桌搬出来，用水将棉被湿透铺在方桌上，让新四军战士顶着方桌前进。苏南反顽战役结束后，新四军有伤病员50多人，这些伤病员考虑到随队前进不利于部队的行动，请求留在石臼湖上养伤。伤员们怕被敌军发现，就吃生米、喝生水、吃生鱼。溧水的6月，水边蚊虫铺天盖地，伤员们忍受着蚊虫叮咬和湿热的天气，靠意志忍耐着。一天傍晚，湖中芦苇丛有“嘎嘎”的叫声，大家以为是野鸭，打算改善伙食，但发现竟是家鸭，通讯员就上岸挨家挨户询问，终于找到了失主，归还了鸭子。百姓很受感动，把伤病员接到家中养伤，派人放哨，伤病员也帮百姓干农活。石臼湖边这段军民鱼水情，被称为“溧水的沙家浜”。



“陕北共产党奠基人”李子洲

□ 韩 笑

在党的历史上，李子洲是一位对党领导的陕西革命斗争特别是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作出开创性贡献的革命先驱，被毛泽东称为“陕北共产党奠基人”。在十余年的革命斗争中，李子洲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展现和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应有的革命精神。

（一）

在革命斗争中，李子洲不断上下求索，从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到创办进步刊物再到领导开展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无不展现出开拓进取、敢闯新路的精神。

李子洲1892年12月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城关镇。1917年夏，李子洲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此后的6年在新文化运动的氛围中、五四运动的浪潮中进一步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并受到了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直接而深刻的引领和影响。1920年3月，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立后，李子洲成为最早报名参加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骨干之一，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1923年初，李子洲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求学期间，李子洲还积极创办进步刊物。1920年1月，在李子洲等人的努力下，《秦钟》月刊创刊并先后出版了6期，《秦钟》月刊创刊并先后出版了6期，李子洲亲自担任发行工作。《秦钟》因故停刊后，李子洲于1921年10月同魏野畴等人创办了《共进》半月刊，大力宣传进步思想。

1923年夏，李子洲从北京大学

毕业，随即回到陕西开展革命工作。此时，陕北地区还没有党的组织。他先到陕北榆林中学任教，后又于1924年春到陕西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即绥德四师）担任校长。其间，李子洲积极领导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很快在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建立了中共绥德四师特别支部。到1926年冬，绥德四师80%的学生都加入了党组织或团组织。除此之外，李子洲还积极领导在榆林中学等地以及国民军部队中发展党员。在李子洲的领导下，谢厅长、刘志丹等一批革命青年陆续入党，陕西的革命星火点点闪亮。

（二）

在革命斗争中，李子洲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积极领导和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斗争，充分展现了依靠群众、一心为民的精神。

李子洲到绥德四师担任校长之后，积极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还亲自登台讲解《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等经典文献。在李子洲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成为绥德四师学生们的必修课，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书籍和一些党的刊物也进入了绥德四师的图书馆，马克思主义很快就在绥德四师的校园中传播开来。此外，李子洲还带领绥德四师的广大师生深入到农村之中，积极利用说书、短剧等形式向广大农民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发动广大师生开办起了夜校，吸收周边地区的农民们前来学习革命思

想。在李子洲等人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陕北地区特别是绥德地区迅速传播开来。

李子洲还积极领导人民群众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在李子洲的领导下，绥德四师逐渐成为陕西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和发动机，被称为“陕北地区的上海大学”。1925年夏，驱逐军阀吴新田的学生运动于西安爆发，李子洲到陕军杨虎城部开展工作，积极声援西安学生的正义之举。1926年6月，陕北地区发生旱灾，他提出“到民间去、开展农民运动”的口号，组织绥德四师的广大师生们来到乡间，在很多村庄建立了农民协会及党团组织，积极发动农民进行斗争。在李子洲等人的领导下，各类群众组织在绥德地区乃至整个陕北地区建立起来，革命形势日益高涨。

（三）

在革命斗争中，李子洲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都始终坚持英勇斗争、勇于担当，并贯穿了李子洲的革命生涯。

1915年5月，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到陕西西安，在三秦公学读书的李子洲义愤填膺，毅然投身到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之中，奔走呼号、散发传单、发表演说。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李子洲作为五四游行大会主席团的成员积极投身于斗争之中，参加了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

在冲突中被反动军警打伤后仍不顾伤痛、坚持斗争。1925年夏，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西，李子洲领导绥德四师的学生们上街举行游行示威，坚决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倒行逆施。

1927年7月，随着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大革命失败。在白色恐怖中，中共陕甘区委改组为中共陕西省委，李子洲担任了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当年9月上旬，李子洲从武汉返回之后即向中共陕西省委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主持召开了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之后，李子洲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军委书记，承担起直接领导陕西武装斗争的重任。在此后的近一年中，他先后于1927年10月、1928年5月领导发动了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这两次起义失败了，但是却在西北地区响亮地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扩大了党在西北地区的影响。1929年1月，在中共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上，时任代理省委书记的李子洲成为主要的批评对象，但即使如此，李子洲也没有消沉而是继续坚持工作，体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

1929年2月初，由于叛徒出卖，李子洲不幸被捕。在狱中，李子洲强忍病痛，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把监狱变成了对敌斗争的战场。6月18日，在饱受敌人的摧残之后，李子洲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奋斗到了最后一息并最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